



—— 中國人民大學 ——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RUC Perspectives

思想评论

罗来军：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顶层方案
——设计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第2期（总第18期）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顶层方案

——设计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罗来军*

【阅读提示】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不断地提出新主张新方案，而且，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程度不断地加强。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存在诸多挑战。推进国际合作历来都是相当困难的，2009年以来，一些国家出台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比自由贸易政策还要多。中国国际战略重心“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任务较重，全球中低等收入水平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秩序的相对力量仍较薄弱，当前的人均GDP并不高。

美国进行国际收缩，联合国决议又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时，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即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中国完成这一使命，需要寻找和确立相应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模式。本报告先提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即承载各国利益、平衡多方诉求的经济规律；而后依据和顺应经济规律，确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即共生、共治、共享；再者，从三项根本理念推导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体的三重模式，即共生模式、共治模式、共享模式。“经济规律——根本理念——三重模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从经济规律内在地推导出三项根本理念，再从三项根本理念内在地推导出三重模式，这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能够获得理论生命力与实践可行性。

最后，本报告提出中国引领国际秩序建设的思考：由重视“事项建设”转向“事项建设”与“规则制定”并重；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关切制订全球治理顶层方案；由“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表达转向“共生共治共享”的核心表达；把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的逻辑次序反转过来；强调世界视野淡化“中国式”表达。

一、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

（一）中国积极提出全球治理新主张新方案

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国际事件和国际舞台上提出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方案，比如“一带一路”国际倡议、2016年G20杭州峰会、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峰会、2017年金砖厦门峰会等国际性会议。习近平主席在多种重要的国际场合提出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主张和建议（具体参见表1），这些内容表明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自中国的一些倡议和主张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赞誉，并逐步形成国际共识，以及逐渐转化为各国共同遵守的实践行为。

表 1 习近平主席近三年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

时间	核心主张	国际场合
2015 年 3 月 28 日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	习主席在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开幕辞
2015 年 9 月 26 日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习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讲话
2015 年 9 月 28 日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话
2016 年 9 月 4 日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开幕辞
2017 年 1 月 17 日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习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2017 年 1 月 18 日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
2017 年 5 月 14 日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开幕词
2017 年 7 月 7 日	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	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上讲话
2017 年 9 月 3 日	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习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讲话

资料来源：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国外学者 Flowerdew 指出，词汇的重复和规范化有助于政治家引导受众发现自己的关注点。通过词汇的重复，加深受众对词汇的认知，以实现话语建构者的理念在受众中的传递。根据 Flowerdew 的理论，对习近平主席全球治理相关讲话的词汇分析可以揭示中国关于全球治理主张的取向，以及这种主张或其影响力在国际形势变化发展过程中逐步体制化、规范化的过程。为此，有研究对 2013 年到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讲话进行词频分析，找出前十位的高频词，具体信息请参见表 2。

表 2 习近平主席 2013-2016 年全球治理讲话前十位高频词统计信息

时间及 频次	高频词									
	发展	合作	中国	国家	我们	世界	共同	人民	国际	经济
2013	225	141	168	128	119	96	94	94	49	64
2014	271	250	299	166	150	131	109	115	118	88
2015	575	515	502	259	264	198	192	178	198	177
2016	177	211	93	87	63	39	56	48	67	51
频次 合计	1248	1117	1062	640	596	464	451	435	432	380
频次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资料来源：相关研究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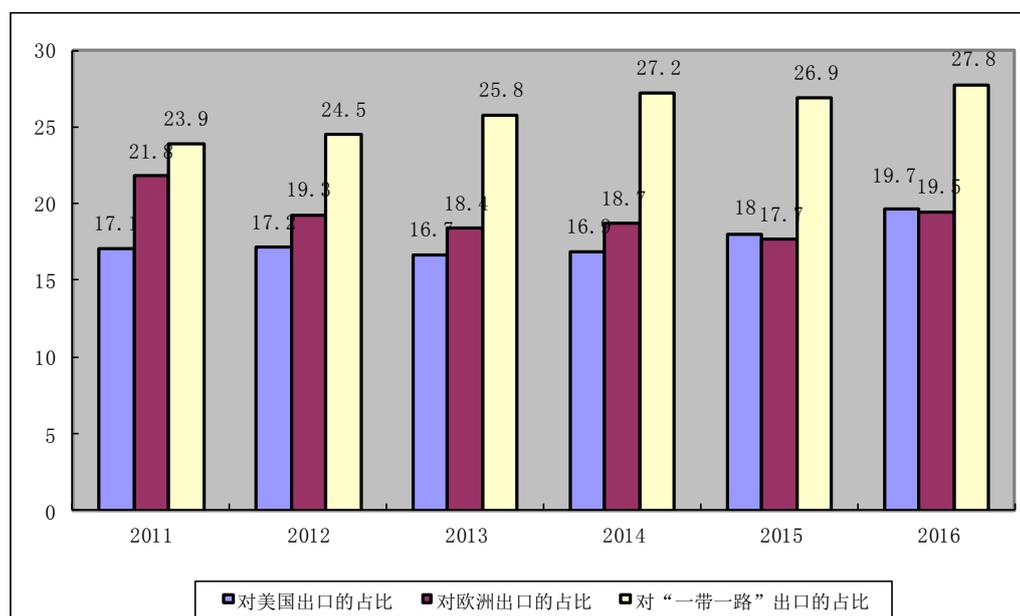
表 2 所列示的十个高频词反映了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核心内容，把这些高频词排列起来，添加几个连接词便可以得到一种意思明确的表达，即“中国|我们（与）世界（各个）国家|人民，共同（致力于）国际合作、经济发展”。高频词表明习近平主席高度强调了这些词，多次通过这些词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即我们愿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国际合作与经济发展。

（二）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不断加强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决定权不断增加。2010 年，中国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从 2.77% 提高到 4.42%，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二大股东；2016 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额占比从 3.996% 升至 6.394%，正式成为 IMF 第三大股东；2016 年 10 月 1 日起，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货币，其中美元权重 41.73%，欧元权重 30.93%，人民币权重 10.92%。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建设，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不断增强。

在当今逆全球化形势下，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积极承担起大国责任，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推进区域合作和提升全球化的方案和主张。“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前引领双多边国际合作的明星战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对外经贸发展政策沟通，主动宣传、推介“一带一路”合作理念，得到了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已经与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建设了 56 个经贸合作区，涉及多个领域，累计投资超过 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 11 亿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不断增加，其增速超过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速，到 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总额在中国总出口额中的占比达到了 27.8%，具体参见图 1。而与“一带一路”紧密相连的亚投行建设截至 2015 年，已有 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逆全球化的不利形势下，中国的全球化行动，强有力地弥补了欧美强国在全球化行动中的缺位。

图1 中国对“一带一路”、美国、欧洲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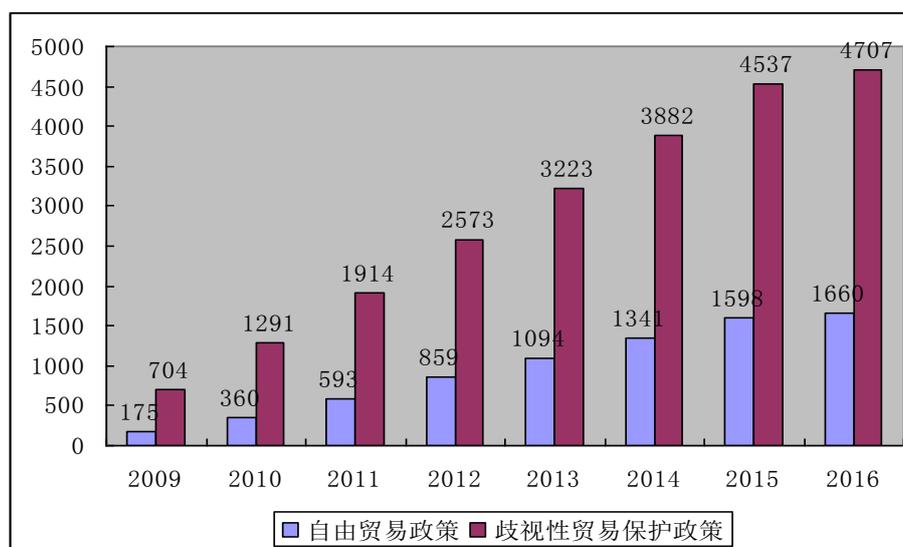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中国统计年鉴

二、塑造新型全球秩序存在诸多挑战

（一）推进国际合作历来都是相当困难的挑战

虽然世界各国和人们都普遍认为自由贸易对各个国家都有好处，都能够获得贸易利得，但是，在实践中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以及投资便利化，一直都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当世界经济与各个国家国内经济遭遇困难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措施就会更加严重。WTO的一项统计表明，WTO成员国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2009年以来，G20国家出台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比自由贸易政策还要多，而且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数量快速增加，2016年为自由贸易政策数量的2.8倍，具体参见图2。

图 2 G20 国家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数量的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Simon J. Evenett, Johannes Fritz. Global Trade Plateaus: The 19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GTA: CEPR PRESS。其中未统计欧盟数据。

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2007 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 6.9%，2008—2015 年平均增长约 3.1%，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 1.2%，不到金融危机前 10 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 6.7% 水平的一半，今年 WTO 也将贸易增长由 2.8% 下调至 1.7%，贸易对 GDP 的创造效应大大下降。事实表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把各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给拯救出来，相反，严重妨碍了全球增长。即使如此，很多国家依然在一些领域优先保护本身利益，致使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推进很困难，形成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艰苦博弈。在国际合作的上述背景下，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力促世界各国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以及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无疑存在着多种困难以及不确定性。

（二）中国国际战略重心“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任务较重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沿线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四个收入国家组：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

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并将这四组与世界相应的分组进行比较（具体指标值参见表 3），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一带一路”四个收入国家组的具体国家如下。高收入国家：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文莱、以色列、韩国、塞浦路斯、沙特、斯洛文尼亚、巴林、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阿曼、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以及克罗地亚等 20 个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罗马尼亚、黎巴嫩、保加利亚、黑山、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伊拉克、马尔代夫、泰国、塞尔维亚、约旦、马其顿王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等 21 个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亚美尼亚、蒙古、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埃及、乌克兰、不丹、东帝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老挝、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吉尔吉斯斯坦、缅甸、柬埔寨等 19 个国家；低收入国家：尼泊尔、阿富汗 2 个。以上四个收入国家组共包括 62 个国家。

表 3 的数据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中低等收入人口为主体，制造业发展相对不足，但是经济的发展速度较高。“一带一路”19 个中低等收入国家总人口有 24 亿，占全球该发展水平总人口的 82%，全球中低等收入水平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中低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34%，即意味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些人口又处于比较贫穷的经

济水平，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这么大规模比较贫穷人口的发展问题，经济任务是比较重的。

表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分组主要经济指标对比（2010—2015）

分组	人均国民收入 (美元)	人口 (百万)	制造业增加值 GDP 占比 (%)	6年 GDP 增速 (%)
世界高收入国家	41925	1187	14.8	1.9
“一带一路” 高收入国家	27702	195	16.8	3
世界中高等收入国家	8255	2593	21	5.1
“一带一路” 中高等收入国家	7123	529	14.7	3.5
世界中低等收入国家	4508	2927	16.4	5.7
“一带一路” 中低等收入国家	2309	2399	14.8	5.9
世界低收入国家	2032	638	8.2	5.4
“一带一路” 低收入国家	670	61	9.2	4.9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数据年限为 2014 年，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数据年限为 2013 年，其余均为 2015 年。

（三）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秩序的相对力量仍较薄弱

中国对于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主张，而且一些主张逐步形成了国际共识，并转化为实践。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在国际秩序的建设上也存在着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问题，中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弥补这一问题。中日都曾提出过东南亚合作的问题，对两

国提出这一想法时的人均 GDP 作一比较。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 10 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有“心心相印”合作想法。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于 1977 年 8 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也曾提出与东南亚“心心相印”的“福田主义”，强化日本与东南亚的互惠关系。如表 4 所示，1977 年，日本人均 GDP 为美国的 68.7%，为新加坡的 1.7 倍，而 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为美国的 23.4%，为新加坡的 15.3%；再以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对比一下，1977 年，日本人均 GDP 为印度尼西亚的 7.2 倍，为越南的 14.7 倍，而 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为印度尼西亚的 1.2 倍，为越南的 2.3 倍。

表 4 中、日提出与东南亚构建合作关系时的人均 GDP 水平比较

2013（中国提出时间）			1977（日本提出时间）		
国别	人均 GDP	中国/该国	国别	人均 GDP	日本/该国
中国	12368	100%	日本	12064	100%
日本	39023	31.7%	中国	894	13.5
美国	52750	23.4%	美国	17567	68.7%
新加坡	80768	15.3%	新加坡	7223	1.7
马来西亚	24231	51.0%	马来西亚	3076	3.9
泰国	15435	80.1%	泰国	2249	5.4
印度尼西亚	10010	1.2	印度尼西亚	1675	7.2
菲律宾	6587	1.9	菲律宾	2210	5.5
越南	5300	2.3	越南	818	14.7
老挝	4954	2.5	老挝	821	14.7
缅甸	4479	2.8	缅甸	--	--
柬埔寨	3058	4.1	柬埔寨	717	16.8

资料来源：1977 年数据来自安格斯·麦迪森，2013 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两者均是购买力平价（PPP）数值。

三、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根本理念与三重模式

美国进行国际收缩，同时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此时，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即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中国完成这一世界赋予的使命，需要寻找和确立相应的理论构建，以及相应的实践模式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

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思想点出了进行全球治理的最为根本的要旨，即保障各国利益。而保障各国利益，则需要建立在经济规律之上。

为此，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就是承载各国利益、平衡多方诉求的经济规律。依据这样的经济规律，才能够寻找到并能够切实推行根本性的、规律性的、长期性的全球治理思路 and 模式，以此构建理论先进、模式可行、成效卓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机制。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

依据和顺应经济规律，确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即共生、共治、共享。

1.共生理念

共生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互利关系，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这一概念完全适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也即是说，世界各国存在着共生关系，一国离不开他国和世界，一国也能够为他国和世界做出贡献。世界各国应该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也能够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

的共生关系既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又是不可替代的生存根基。

对于共生这一理念，虽然中国以前并未明确地、准确地概括出来，但是，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舞台上已经多次提出和倡导共生的内容和精神。中国在国际上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杭州 G20 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习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上述诸多内容，都是中国实际倡导共生理念的具体体现。

2. 共治理念

世界各国的共生关系通过共治才能得以实现。同共生理念一样，虽然中国以前并未明确地、准确地概括出来共治理念，但是，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舞台上已经多次提出和倡导共治的内容和精神。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明确指出其合作机制是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既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又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并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建。中国在杭州 G20 峰会上提出、倡导和强调了多种问题的共治主张和共治机制，提出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习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也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3.共享理念

从共生到共治再到共享，共享是最终的目的。与共生、共治理念所不同的是，共享理念早已多次被中国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上呼吁和倡导。在杭州 G20 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各国传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就是共享。习总书记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共享的重要性和中国的作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倡议“一带一路”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大规模引进来和大踏步走出去并重，加强与世界经济联动；中国倡导新机制新倡议，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习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的主旨演讲进一步强调了共享理念：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共生、共治、共享这三项根本理念，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依据。共生揭示世界各国存在着利益关联，彼此离不开对方；共治反映了世界各国潜在的关联利益需要大家共同治理才能得以实现，大家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共享预示了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各方均能获得利益和实惠。正是由于上述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才把共生、共治、共享放在一起，共同作为根本理念提炼出来。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模式

从三重根本理念内在地推导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模式。

第一重模式：体现各国利益的共生模式。这由共生理念导出。

共生理念表明，世界各国存在着共生关系，一国同他国和世界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既然世界各国存在着共生关系，那么，具体的共生关系是什么，如何最佳体现各国的利益，这项内容就是共生模式所要完成的任务。表明存在共生关系的共生理念并不复杂，然而，准确客观地确定出不同国家之间的最优共生关系，将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信仰、历史渊源、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皆存在着较大差异，各国之间的共生关系势必受到诸多差异因素的影响，变得非常复杂。为了应对复杂的局面，共生模式需要组建专业团队进行具体深入的测算、分析和论证，充分考虑各国利益诉求——协调平衡各国利益——形成承载各国利益的共生方案。科学、合理、有效的共生方案，会较容易地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这就为下一步的共治奠定了实现的基础。

第二重模式：实现各国利益的共治模式。这由共治理念导出。

共治模式就是世界各国进行共同治理的具体行动模式，这一模式的要旨是要保障各个国家参与共治，即实现共治。构建这样的共治模式，其主体架构应确定为“平等——共商——共建”。首先，各国要平等。中国提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

等。其次，规则要共商。对于需要共治的全球问题，各个国家如何进行共治，采取什么样的方案，主要的规则与秩序是什么，这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协商。第三，行动要共建。也即是说，各个国家要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实际的共同治理行为，而不是个别国家的独角戏。当然，各个国家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共治中所承担的角色、责任会不同，需要进行分工与合作。构建“平等——共商——共建”的共治模式，以保障共治得以实现。

第三重模式：各国分享利益的共享模式。这由共享理念导出。

共生模式在理论和方案上确定出“世界大蛋糕”，共治模式是这块“世界大蛋糕”得以做出来，那么，共享模式则是在世界各国之间如何分享这块“世界大蛋糕”。共享模式需要确定好以下三个重要内容：一是一国所分享的蛋糕份额要与其所承担的责任、所做出的贡献相匹配；二是考虑到世界上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依然严峻，大国强国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让利于弱国和落后国家；三是对于气候、环保等全球公共问题，大国强国适当多承担责任，允许弱国和落后国家一定程度地“搭便车”。由于各国所承担的责任、所做出的贡献各不相同，与贡献相匹配程度、让利程度、“搭便车”程度，需要确定出各国共同认可的程度具体标准及其依据。这需要组建专业团队进行深入的测算、分析和论证，以保证共享模式的“合理公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重模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整体的全球治理模式。由于共生模式、共治模式、共享模式是从共生、共治、共享三项根本理念推导出来，为此，

三重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类似于三项理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共生模式是确定各国利益共生关系的模式，各国利益在共生模式中都能够得以体现；共治模式是实现各国共生利益的模式，通过各国的共治把共生利益变为现实；共享模式是各国分享所实现的共生利益的模式，各国合理公平地分享到全球治理利益。三重模式一重套一重，共同构成科学有效的整体治理模式。

当好国际领导者，不是靠言论，也不是靠利益输送，而是要靠经济规律和政治价值观。哪个国家能够确定出各国利益的共生关系，进而确定出体现各国利益的治理模式；并能够引导和组织国际社会通过共治实现这种模式；再把握好共享机制，让各国真正分享到全球治理的利益，哪个国家才能够长久地、稳定地成为新型全球治理的领导者。

四、中国引领国际秩序建设的思考

（一）由重视“事项建设”转向“事项建设”与“规则制定”并重

促成各国之间的有效合作，建设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绝非易事。如果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则需要不断地思索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的方法。当前，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事项，均取得了令人意外的进展和成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进行总结，并争取在今后做得更好。此外，我国在重视“事项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和重视推进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如前文所述，推进国际合作历来都是相当困难的挑战，而且我国的相对力量仍较薄弱，那么这就需要我国采取相应

的合理方法，在注重“事项建设”这种“硬投入”的同时，也要注重“规则制定”这种“软输出”，即对于国与国之间需要进行合作的事项和领域，探索、制订、完善各国合作共赢的做事规则。各国只要遵循规则进行合作，就能增进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规则制定”是探索和确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长期构建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可行的、可持续的方法和手段。

（二）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关切制订全球治理顶层方案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需要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同样的道理，对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也需要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在过去，WTO等全球治理体系或机制偏重于各国合作的规则制定，比如贸易自由化，但对各国在具体的产业、企业、项目、领域等方面的合作可能性以及最优方式，缺乏思考、论证和指导，也即是说，过去的全球治理缺乏方案式设计。当前，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应尝试运用方案设计这种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以寻求全球治理的新突破。中国应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关切制订全球治理的顶层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项根本理念，以及基于三项根本理念搭建的三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是基于最根本的经济规律，秉承高度的内在逻辑性，所提出的全球治理解决方案，勾列出了全球治理顶层方案的基本框架和关键元素。该类方案具有根本的、内在的生命力，也具有令各个国家信服的说服力，为此，对这样方案的国际社会认可、接受和执行，值得期待。

（三）由“共商共建共享”转向“共生共治共享”

当前阶段，我国对国际合作所表达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主张是“共商、共建、共享”，很显然，这种核心表达是非常有助于推动国际合作的，指明了国际合作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方向，即规则上要共商、行动上要共建、成果上要共享。然而，仍需提出的是，“共商、共建、共享”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改进为“共生、共治、共享”。首先，增加“共生”一词，既非常必要又非常重要。共生原本是指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互利关系，这一概念完全适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即世界各国存在着互利关系。通过“共生”一词来强调“一国离不开他国和世界，一国也能够为他国和世界做出贡献。世界各国应该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也能够做到共生共存、互助互利。”其次，“共商”和“共建”两个词的涵义可以纳入“共治”的范畴。“共治”一词强调和传达三个涵义：各国要平等、规则要共商、行动要共建。

（四）把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的逻辑次序反转过来

各国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应该依据一定的内在逻辑次序，这种逻辑次序就是“共生——共治——共享”。共生、共治、共享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由始至终，环环相扣，彼此制约：共生揭示世界各国存在着利益关联，彼此离不开对方；共治反映了世界各国潜在的关联利益需要大家共同治理才能得以实现，大家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共享预示了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各方均能获得利益和实惠。因为各国存在“共生”关系，才有必要各国致力于“共

治”，而“共治”成果需要实现“共享”，否则，“共生”无法实现，“共治”也无法维持下去。在过去，我国制订国际政策与策略的着眼点较多地放在“共享”环节，即所提出的政策与方案直奔“共享”愿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所提政策与方案容易展现出光明美好的前景，不足之处是容易导致可行性不强，出现喊口号的嫌疑。今后做策划的逻辑次序宜从“共生”出发，先思考各国的实际诉求和利害关系，再谋划可行的行动方案，而后提出所能分享的前景。上述逻辑次序有助于化解喊口号的质疑，增强所提理念和方案的可实施程度。

（五）强调世界视野淡化“中国式”表达

一国成为国际秩序建设的引领者，或者一国方案成为世界解决方案，不是取决于自身评价，而是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心灵认可与行为接受。而且，自身过度地评价和赞扬，反而有可能会妨碍自身的国际形象。比如，有学者提出和强调“中式全球化”，过去的全球化可以称为“美式全球化”，这在理论探讨和方式思考上都非常可贵，但是在实际事务协调和理念宣传上切忌如此说法。美国在过去那么多年对国际事务协调起主要作用或者协调作用，也没有提出“美式全球化”，反而是当今中国人为之提出，这并不是美国人情商智商不高，而是他们的思维没有过度强调从美国出发，他们也认识到过度强调从美国出发的提案会妨碍其他国家对提案的认可。目前，中国对全球治理起到了重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在表达方式上不宜过度标示从中国出发、中国智慧等内容。中国实际做到国际秩序建设的引领者，就需要有大国风范、大国胸怀、大国担当。而真正的大国

风范、大国胸怀、大国担当就是世界视野、全球胸怀、天下思维。按照中国古代的智慧，就是“以天下观天下”。

电 话：010-62512142
邮 箱：nads-qk@ruc.edu.cn
网 址：<http://nads.ruc.edu.cn>



思想决定命运。
研究关乎国家方向的思想问题和话语权，
高端智库责无旁贷。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责编：杨端程